
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

邓 红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投身到抗日战争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学术课题。无疑,中共采取的减租减息、统一累进税等改革措施,对于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他方面社会改革的作用也不能忽略。笔者认为,社会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民族教育、国防教育,也包括科学文化教育、生产教育、移风易俗教育等多项内容,它们在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对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主要形式、特点和功能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 边区社会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

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主要经历了初创、发展、艰苦生存和恢复壮大四个阶段,这与边区的创立和发展历程是基本一致的。

(一) 初创阶段(1937年底—1938年)

1937年底,聂荣臻率部创建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的社会教育亦随之开始。边区建立农、工、妇、青各抗日救国团体及男女自卫队,并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抗战光荣”、“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治和政策教育。1938年,晋察冀边区政府

提出：“为了使广大民众，能够实地参加抗战，必须首先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提高他们对抗战的认识与抗战胜利的信心，才能达到。因此，对民众的教育工作是使民众从抗战的认识到的行动这一过程中的必要的推动工作。”^①为此，边区政府发起了利用农闲期间，开展以政治和文化教育为中心的冬学运动（简称“冬运”）。冀中区和北岳区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制定了冬学计划，在小学、村公所、庙宇或较大的民房内建立了冬学民校、识字班、夜校。广大民众“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形成边区的第一次冬学运动。在冀中有26县共开办民众学校450个，识字班1597个，学员69826人。在北岳区（平西、雁北除外），成立民校，识字班2000多处，学员181794人。^②

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开展还不够普及，除冀中和北岳区外，其他地区还未进行。在教学组织、内容、教材、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等方面也都存在诸多不足。

（二）发展阶段（1939年—1940年）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边区社会教育事业日益发展。1939年，在冀中区，建立民校识字班3574个，拥有学员167705人^③，比1938年增加学员9万余人。冀西四专区的唐、完、阜、曲、定五县，建立民校2275个，拥有学员155994人。^④“小先生”制、读报小组、歌咏队、宣传队等亦作为社教的补充形式普遍开展起来。到1939年底，1940年初，边区共扫除文盲50多万人，有的

① 《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社会教育分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 《冀中五年教育工作总结》，《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367页。

③ ④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概况介绍》，《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五六十岁的老大娘也能识 200 多字。^① 1940 年, 社会教育进一步发展, 冀中七、八、十专区 14 县, 建立民校 2136 个, 学员达 391915 人, 比 1939 年增加学员 22 万余人。^② 即便在日伪影响较大地区, 社教工作也开展起来, “在游击区和据点附近的村子都普遍建立民众学校、识字班”。^③ 如新乐建民校 201 个, 学员 3 万, 占全县人口 60%; 定县 142 村, 有民校 194 个; 灵寿 60 个; 定兴 78 个。^④ 边区政府秘书长娄凝先说: “这一切虽然还没有精确完备的统计, 但已很显明地说明着边区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是大大地提高了。”^⑤

这两年, 边区社会教育管理体制趋于正规。社教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边区教育处, 掌握社教的大政方针; 其次是行署教育厅(科), 对该地区社教工作进行全面、集中的领导; 再次是县教育科, 具体制定和执行社教计划, 解决全县范围内的种种社教问题; 村教育委员会是最基层的社教组织机构, 负责该村冬学民校、村救亡室、俱乐部的组建。除了边府、行署、县、村四级纵的管理体系外, 为了加强和沟通社教工作与各群众团体、部队、机关、学校等部门横的联系, 在县(区)级还设置了教宣联席会, 由县教育科与农、工、妇、青、文救国会, 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 以及当地驻军、学校的代表参加, 作为社教的辅导组织, 配合社教工作的开展。

为了保证社教工作的顺利进行, 边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 其主要内容有: 边区政府组织专门的巡视督学团, 到各

①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 《边区教育》1940 年 1 月 15 日第 2 卷第 1 期。

② 《八年来边区社会教育概况》, 《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 第 265 页。

③ 《敌后的社会教育》, 《新华日报》1943 年 10 月 6 日。

④ 《晋察冀边区群众文化教育的新进展》, 《新华日报》1940 年 6 月 18 日。

⑤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 《边区教育》1940 年 1 月 15 日第 2 卷第 1 期。

地巡回检查;县教育干部对区村的社教工作进行考核指导,每月底检查情况向上级报告;学制、教学进程、教学经费、师资选择培训及待遇、学员奖惩等方面的规定等等。如教材编发规定,识字课本及思想、政策等基本教材,由边委会及边区抗联统一编印发行;时事教材、地方性法令及生产技术教育等,由县教育科专人负责搜集编辑和印发。又如师资选择培训规定,教师由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较高政治觉悟的小学教师、干部或社会民主人士担任,成立“民众教师训练班”、“文化教育流动训练班”等,造就大批地方社教人才。总之,边区社会教育的管理,已基本实现了“教育制度及其机构做到真正的科学化,一切工作的进行完全有计划性”。^①

(三) 艰难生存阶段(1941—1943年)

1941至1943年,是晋察冀边区最为艰苦的三年,日军频繁“扫荡”,给边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空前灾难。在此情况下,边区社会教育艰难生存。如北岳区,1941年仍有民校2894个,学员233592人。^②全边区的民校学员,“由于游击区的增加,总的人数是减少了,但质量是提高了”。^③以冀中为例,通过加强民校教师培训来提高教学质量。每村选派1—3人受训,有的培训结束后还进行示范实习,“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使民校的教学管理上有了很大的改进”。^④冀中还对民校学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300字以下的为文盲;识300字以上、1000字以下的为半文盲;识1000字以上的为非文盲”。^⑤并“将文盲半文盲按年龄分

①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边区教育》1940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

② ③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下,第87页。

④ ⑤ 《冀中五年教育工作的总结》,《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382—385页。

为四种:15岁至25岁的为第一种文盲;26岁至35岁的为第二种文盲;36岁至45岁的为第三种文盲;46岁以上的为第四种文盲^①,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各种文盲。1941年冬学运动结束后,冀中“巩固区的十几县青年文盲是扫除得差不多了”。^②

(四) 恢复与壮大阶段(1944年至日本投降)

1944年后,随着敌后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边区社教事业得以恢复和壮大。“首先表现在开展的比较普遍与持久上,无论巩固区与游击区从来没有人问的没有文化的附村小庄子都广泛地进行了冬学工作”。^③如冀中恢复重建地区八分区的定北、晋深等地普遍开展社教;冀晋之阜平每村有民校,曲阳游击区96%的行政村建立了民校;五台县跑泉场等敌人制造的无人区,也成立了学习组织,定期学习政治和文化^④,甚至有的一个村建有7个民校。^⑤

从整个边区看,1944—1945年,基本实现了村村有民校,处处有社教的热烈场面。一批批学员从民校毕业,再进入小学、中学系统学习。

二 边区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

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复杂,环境恶劣,教育基础落后,边区社教形式不可能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有适合于广大农民的冬学、民校、学习站、传习所和“小先生”制;有适合于城镇居民的民教馆、图书馆;还有遍布边区的歌咏队、秧歌队,乡村剧团

① ② 《冀中五年教育工作的总结》,《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382—385页。

③ 《边委会1944年冬学运动简要总结》,《晋察冀日报》1945年11月28日。

④ 《边委会1944年冬学运动简要总结》,《晋察冀日报》1945年11月28日。

⑤ 《改造中的朱家营民校》,《晋察冀日报》1944年7月18日。

等,这些都是社教的重要形式。

社会教育形式中最有特色、规模最大、成绩最突出的是冬学运动和民众学校。

冬学运动是社教发展初期阶段的主要教学形式。由于农民在生产水平低下和战乱环境之中,不可能长年接受教育,而冬季是农民较为闲暇的季节,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根据这一情况,边区社教工作者采取集中突击的方式,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

冬学运动,以宣传动员的方式,鼓励民众入学。冬学运动形式多样,学员可按年龄、性别、住址、文化水平、职业兴趣等自由组合,成立各种识字班、识字组、宣讲组、读报组、医药研究组、家庭识字组、夜校、午校等等。

冬学学习期限4个月左右,一般从11月起,至来年二三月。开学时行开学典礼,布置教学计划;结束时行散学典礼,对该次冬学进行评比总结,并将检查统计材料逐级上报。冬学期间,除放寒假10天及13个星期日外,每日学习两小时,每月测验一次(同时考核老师)。测验后则分区召集教师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研讨改进教学管理方法。请假、点名、转学、奖惩、竞赛等相应制度也随冬学运动的开展健全起来。

冬学课程,主要有政治、文化、生产、珠算、应用文、卫生防疫等。政治课比重占40%左右,包括抗战时事教育。政策教育、民主思想教育。文化课也占40%左右,以识字为主,其他教学内容根据各地群众的需要和时间而定。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授课外,还采取讲故事、座谈会、讨论会等多种教育形式。

如果说冬学运动是一种组织较为松散的社会教育形式,民众学校则较为正规,并带有一定强制性。边区民众,凡识字不足1000,年龄在15—45岁的男子和15—35岁的女子,均须入学,其余民众实行自愿入学。

为便于教学,识字 600 以上者入民校高级班,其余入初级班。授课时间为每次二小时,冬季每日一次,春夏秋季 3—5 日一次(春季农忙时节每 10 日一次)。修业期限为 4 年,初高级各两年。每年 3—10 月为第一学期,11 月—次年 2 月为第二学期。每月末测验一次,学期末总测验一次,成绩优良者升级,不合格者留级。两年修业期满举行毕业考试,合格者由村公所报请县政府发毕业证书,准予毕业,否则继续留校学习。学习均于生产暇余时间进行,学员不脱离生产。民校中选择教材、聘请教师、教学计划、经费收支、教学督测等各项工作,皆严格遵照边府颁布的《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执行。^①

在边区政权不巩固的游击区或接近边区的敌占区,则以学习站、传习所等形式开展社教工作。先在政民工作有一定基础的村庄建立学习站或传习所,遵照边府《学习站办理通则》逐步开展。教学上一般不以班级编排,而以小组进行,自由组合,以利于隐蔽;多配备教师,以便于分散教学;无固定的校址,以游击方式,秘密设学;多在夜晚施教并配有岗哨严密戒备。在敌人统治势力特别强的村庄,则用“咬耳朵”的方式进行(一传二,二传四,四传八),并配合武装斗争进行“闪击教育”。教学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因此,即便在日伪影响较大的游击区,甚至敌占区,社教工作仍能开展。

“小先生”制,是利用小学教育,对由于偏远、零散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未能入学的民众进行以识字扫盲为主的社教形式。“小先生”由学校选择小学三年级以上的优秀学生担任,由“小先生”自己

^① 参见《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晋察冀日报》1942年5月8日。《边委会关于整理与建立民校的指示》,《边政导报》1942年2月19日第4卷第7、8期合刊。《民众学校教学法》,《边区教育》1939年9月26日第1卷第7期。

负责招收了3—15个学员,设一学习小组,对象多为自己的家庭成员或邻居。以‘即知即传’的方式传授知识。时间多在每日午后歇晌(下午1—3时)。学校教师对“小先生”的教学状况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指导,以保证其质量。由于“小先生”制规模小,时间、地点、教学组织等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因此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就得到广泛推广。早在1938年的冀西农村,就随处可见这样的景象,“每在午饭以后,或黄昏时分常常有四五个或八九个农夫蹲在树下,或屋檐下,听着小先生教唱歌或识字”。^①“小先生”制使许多不能入民校进冬学的边区民众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

对边区城镇的工人、店员、市民和商人的教育,因其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多按生产部门组织教育。一般以民教馆为中心,并组建各种工人夜校、补习小组、店员小组、业余公校等经常性的业余学习组织。还以设图书馆、书店,办书报阅览室、公共阅报牌、黑板报、播音机,开通俗讲演会等形式教育民众。学习内容,以政治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为主,其次是识字、算术等基础文化教育,还有卫生及工商政策教育等。通过这些教育,既充实了城镇民众的业余生活,又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

此外,通过对大鼓、歌咏、戏剧等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加以改造革新,使之成为边区社会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1940年4月统计,平、灵、完三县的妇女剧团即达40个,歌咏队96个;阜平有剧团90个,歌咏队100个;平山有秧歌队41个,高跷班85个,小唱班135个。^②饶阳、武强还专门培训了许多说大鼓的人,到处说唱抗战救国的故事,“使广大群众对文化能够进一步的实际参

① 《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新华日报》1938年9月3日。

② 《杨耕田同志报告关于边区社会教育的一些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

加与享受”。^①

三 边区社会教育的功能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功能首先体现在：通过抗战教育，提高广大民众的抗日觉悟，调动其抗日积极性。

抗战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使民众对抗战与国家、个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抗战中应负的责任，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抗战教育对于肃清汉奸言论，揭露日寇的侵略性、残暴性及其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使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彻底抗日思想广泛渗透于民众头脑之中；抗战教育介绍抗日形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动向，使民众认识到抗战的艰苦性、长期性，并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抗战教育结合各阶段的抗战特点，进行参军、献粮，反奸、反特、反投降，反掠夺、反“扫荡”，坚壁清野等不同重点的社会教育，发生的作用正如边区政府秘书长娄凝先在总结边区教育的成绩时所说：“造成武装上前线的热潮……几乎每一县区都能超过原来预定的额数”^②；在边区，部队“一切给养、担架、运输，可以用不着操心”；“即在平时的财力的动员，也都表现了惊人的速度与成绩”。^③“群众之所以这样坚韧、刚毅，一方面是对日寇有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同时和社会教育的开展也是分不开的”。^④广大边区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已经“迅速赶上目前

① 《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抗敌报》1940年8月25日。

②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边区教育》1940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

③ 《二年来边区教育工作的回顾与瞻望》，《边区教育》1940年1月15日第2卷第1期。

④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概况介绍》，《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第291页。

抗战形势要求的一般水准”^①，“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模范的政治速成学校”。^②

社会教育的第二个功能是，推动了边区社会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社会教育的经常性内容。它以“推动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讲授改良生产的科学知识”为主^③，并教育帮助民众因地制宜地“计划、组织、劳动，增加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④在棉花产区，注重改良推广棉纺技术，培养纺织人才，开展纺织工业。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造纸技术，开展造纸工业；办草帽训练班、合作社供给合作训练班、贸易学校等等，对民众进行短期职业技术教育。这些教育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社会教育还积极配合边区政府各阶段的社会经济中心工作，开展了抗洪救灾、增产节约教育，防毒防疫、清洁卫生教育，公粮动员、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教育，土地调查教育，春耕秋收教育，民主选举教育，合作运动教育等活动。社会教育“渗透到每项工作中去，使它更能迅速地开展，更能够收到实际的成效”。^⑤以1939年边区大水灾为例，社教即以互爱互助、抗洪救灾为中心，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第二年春，又掀起了妇女儿童亦普遍参加的大规模春耕生产运动。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充分肯定了社会教育在救灾工作中的成就。^⑥

社会教育的第三个功能是移风易俗。“它对群众思想意识的改

① 《开展冬学运动》，《抗敌报》1938年12月6日。

② 《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应努力的方向及当前的几个具体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147页。

③ ④ 《统一认识，加强领导，使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边政导报》1944年4月11日。

⑤ 《冬学运动的号召》，《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76页。

⑥ 《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应努力的方向及当前的几个具体问题》，同上书，第150页。

造,对群众生活习惯的改造,确乎是惊人的,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①如封闭狭隘、自由散漫的生活被守纪律、讲团结、有组织的生活所取代;充斥封建迷信的旧戏、西洋景被宣传抗战、文明开化的晚会、戏剧所取代;抽鸦片、赌博、游手好闲的恶习被识字、读报、演讲、讨论、音乐、美术、体操、武术等高尚活动所取代。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社会教育的功能还突出地体现于妇女解放上。边区教育处处长刘皓风在总结边区教育工作时说:“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标志。”^②从社教女学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不难看出,边区许多妇女已从封建的囚笼里解放了出来。以第八专区为例,1938年参加社教的女学员7976人,占学员总数的25%;1939年达48393人,上升至学员总数的30%;1940年达160153人,更升至学员总数的47%。^③在冀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已普遍建立了妇女识字班,大部分青壮年妇女都参加了学习,“念了识字班后,许多青壮年妇女考入高小或当初小教员”。^④大批青中年妇女参加社教,以至“一家之中,婆婆和媳妇,母亲和女儿,嫂嫂和小姑都涌进了学校。互相竞赛、争取‘学习英雄’‘学习战士’的佳话到处传着”。^⑤“有这样一个事实,一般巩固的根据地的青壮年妇女(某些老年妇女)和村妇女干部,许多都带着日记本,大襟上挂着钢笔,都能认识自己的名字,查看路条。一部分青壮年妇女,能够写信记帐,特别是全边区脱离生产的妇女干部,80%以上,过去都是目不识字的劳动妇

① 《杨耕田同志报告关于边区社会教育的一些问题》,《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方针政策分册)上,第191页。

② 《冀中五年教育工作总结》,同上书,第365页。

③ 《冀中教育建设概况》,《晋察日报》1941年8月7日。

④ 《边区妇女的文化学习》,《北方文化》1946年5月16日第1卷第6期。

⑤ 《新民主主义下的妇女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2月13日。

女,现在都能写工作报告和普通信件,能看一般的报纸”。^① 妇女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在田间,在村里,在家中,到处可听到她们的歌声,她们组织秧歌队,参加剧团,春节、“三八”节、“七七”纪念会上,妇女们自编自导,自己上台演出。“过去她们是社会教育开展的主要对象,今天她们已能登上舞台演戏教育旁人了。这是妇女解放史上了不起的一种大进步”。^②

应当承认,由于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在实践中探索、开创出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有些地区凭主观热情,提出过高的目标和要求,重量不重质;有的地区教育干部调动频繁,损害了教育工作的连续性;有的教材政治内容比例过大,社会科学尤其自然科学所占比例太小;有的教材口号化、标语化,不够深入充实,且与现实生活脱节等。应当说,边区社教工作者不仅承认上述不足,而且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只是限于战时环境,有些问题不是一时能解决得了的。

综上所述,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在十分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对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参加边区社会经济建设,对于提高广大边区民众的政治文化素质,都起了重要作用。其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制度等,都是中共对战时民众教育的独创,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邓红,1965年生,河北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边区妇女的文化学习》,《北方文化》1946年5月16日第1卷第6期。

② 《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概况介绍》,《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第293页。